

风铃文丛

必· 死与活着

阎
纲
著



■ 北京文艺出版社

I267 720

阁 纳



FENGLINGWENCONG

必死与活着

北京文艺出版社

3204

424125

必死与活着

阎 纲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625 字数:173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5378—1885—1

I·1827 定价:12.00元



作者简介

1932年8月生，陕西省记泉县人，1949年参加部队宣传队，1950年筹建县文化馆、县文联，1952年上兰州大学中文系，1956年进中国作家协会，1986年调入中央文化部。

参加编辑的报刊有：《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当代文学研究丛刊》、《评论选刊》、《文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热点文学》。出版的评论集、随笔散文集有：《小说论集》、《文坛徜徉录》、《阎纲短评集》、《神·鬼·人》、《余在古园》和《冷落了牡丹》、《一分为三》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

RAG44/04

目 录

第 一 辑

- 1 △ 让种粮的都吃上粮食
5 △ 样板戏与猪舌头
9 △ 文化与赚钱
14 △ “不要忘记国民党”
17 △ 人性的对比
20 △ 孤独
 ——和穆君
24 △ 沉默
 ——和穆君
27 △ 俗人问禅
35 △ 《一分为三》自序
38 △ 啊，羊肉泡！
44 △ 心广体胖
48 △ 必死与活着

第 二 辑

- 53 △ 笑比哭好
59 △ 笑比哭好（续）

目 录

- 68 △ 要命
 ——我与“癌”
- 83 △ 胡杨泪飞
- 87 △ 忍看朋辈成新鬼
- 93 △ “月季王”快镜头
- 95 △ 诗友孙迟
- 101 △ 致光年同志
- 105 △ 杨凤兰与王宝钏
- 111 △ “最后一座医院”的最后一天
- 116 △ 静谧的病房
- 122 △ 与庆生谈鲁迅
- 127 △ 伟哉，司马迁！

第 三 辑

- 133 △ 答《作家人生十问》
- 135 △ 答散文家庞进问
- 139 △ 序《小说十八品》
- 145 △ 《幽默小说选》后记
- 149 △ 想起《论语》

目 录

- 152 △ 文摊秘诀十条
- 154 △ 文风的悲剧
- 159 △ “繁荣文艺”的九〇、九一年
- 168 △ 并非“完整地理解”
——评《邓小平论文艺》的编选工作
- 173 △ 《余在古园》后记
- 176 △ 临终前的忏悔
- 180 △ 中国有没有法捷耶夫？
- 184 △ 传统文化·“后”现代
- 189 △ “告别评论”
- 193 △ 走出荒路
——看电视剧《荒路》
- 198 △ 难得激情
- 202 △ 《微言集》
- 206 △ “中国的哈佛”
- 209 △ 致《群山》作者
- 212 △ 贵在俗说
- 215 △ 论故事
- 218 △ 《四方城》的疑惑

目 录

- 221 △ “学者随笔”随笔
228 △ 九十年代小说随想

让种粮的都吃上粮食

扶贫的大题材把大家引上饥饿大军苦斗的太行山；纪实文学《让历史原谅我们》（《长城》一九九七第四期）使我们相信文学没有忘记农民特别是仍然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八亿贫苦农民。

老舍笔下的人物说过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大意是：一切都是假的，只有窝窝头是真的！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农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是人生第一要义——吃饭。革命多少年没有让种粮的人吃上粮食，那么我们这

些能吃饱粮食的人是怎么搞的嘛！

饥饿的题材非常沉重，谢天谢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救出火坑，党中央又下定二〇〇〇年全国脱贫的决心，井陘县已经作出惊天动地的成绩。大家看看，今天我们和谁坐在一起？“八年的扶贫，八年的坎坷，八年的磨练，使我饱尝了酸甜苦辣，看到了春华秋实”的吕日新来到我们会上；“死了，坟也建在这儿”，终于引进黄桃的新四军王新和园林局王克敏父子俩也来了，我的感觉好极了，情绪好极了，信心增强了，我向在座的扶贫功臣，向当地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党政军民学包括余、陈两位作者立正敬礼！

中国历史，往事越千年，痛苦始终伴随着农民。解放以后，穷过渡，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哪里许种哪里不许种，收打的农产品交多少留多少，自己无权支配，农民完全依附于政府。全国性的几次大折腾，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天文数字的损失有多少转嫁到农民头上？解放至今将近半个世纪，还有这么多农民饿着肚子爱国，革命的良心何在？到底哪儿出问题了？农民是父亲，我们是农民的儿子，是农民把一个馍掰成两半给他的子弟兵或者把整个一个馍全喂给伤病员自己吃树叶，周总理哭了：“我们对不起他们。”李先念说：“历史是不会原谅我们的。”习仲勋说：“你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创业史》写得好，写出农村父老的品德，但是过分强调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一面。岂知，在生活中，“教育”往往变成“教训”。《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写三年困难瞎折腾，种粮的吃不上粮食，而且当犯人抓起来。《阴影》写粉碎“四人帮”之后农村党员出来要饭，按月寄钱交党费，事情就发生在小平同志的家乡广元。从《陈奂生造屋》到《陈奂生上城》我们看到改革开放给农民带来的实惠。

亦喜亦忧，报喜（有时也）报忧，农村有买飞机的，

也有打白条的，也有（就像眼下太行山有的地方那样）全家盖一条棉絮的，有的情况还要严重。

越是贡献大的地方越是贫困，井冈山、太行山、大别山、沂蒙山……沦为挂满勋章的“乞丐”，正像这部作品里所描绘的那样。

亦喜亦忧，党决心扶贫但农业政策有时不能落实。

上上下下养了多少吃公家饭的干部，农民受得了吗？有没有监督体制？

亦喜亦忧，无视农民的生死当然是犯罪，但是对于填不满肚子的农民来说，哪怕百分之零点一的合理负担都是不合理的。

亦喜亦忧，农民刚刚脱贫或者正在脱贫乱摊派就来了，吸血鬼也跟着出现了，单是报纸揭发出来的已经够吓人的。

我们的文学又怎么样呢？

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复归为农民之后，四川的周克芹、贵州的何士光、江苏的高晓声的笔下出现了农民的笑声，《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把笑声带上了银幕，但关注农民的处境（特别是农民的肚皮）的作家仍然不多。我们当时的《文艺报》在首都、上海和西安分别召开农村题材作家座谈会，提醒作家不要忘记奋斗在饥饿线上的农民兄弟。刘绍棠参加会来了，一见面就亮出伴随他多年的黑旧的提包，拍了拍，然后大嗓门地说：“阎纲你看，户口本带来了，开完会这就转户口！”绍棠后来写了大量的好作品。路遥的《人生》影响也很大。但后来，扶贫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下乡的作家却越来越稀少。黄传会了不起，五年里跑遍了二十一个省、六十三个贫困县的山山水水，访问了数百名山村教师和数以千计的失学儿童，完成《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和《中国贫困启示录》三部长篇报告文学，成为中国作家中献身“反贫困”事业的第一人。他说：“我的价值在贫困

山区，在穷苦的老百姓中间。”

余炳年、陈淑敏二位正是在农民“反贫困”题材的作品青黄不接的时候像黄传会一样沉到穷山恶水中去。一个吃惯大米的南方人，徒步来到忍饥受冻的穷山沟，前后跑了好几年，记满多少笔记本？翻破多少参考书？查阅多少报刊杂志？磨秃多少生花笔？这是什么精神？此前，余炳年出版了厚厚一本《“左”家庄的倾斜》，是一位决心致力报告文学而且充满激情与才学的中年报告文学专业作家，眼光远大，思路开阔，文笔恣肆，自信心强，富有思辩性，敢取大景，敢奏黄钟大吕，他的这些特点在《让历史原谅我们》中非常明显，我是在震悚与惊喜中读完这部长篇的。这部作品既使人看到历史的真相同时看到时代的希望，这才是这部作品最可称道的。作品不足之处是该粗的地方大写意、雄气逼人，该细的地方却不够细。许多现实人物都是一口口深井，哪一口井挖下去都是展示文学才能的奇妙世界。西人有言：“认识可悲还是可悲，认识其所以可悲才是伟大。”相比之下，作品的喜剧诗意小于悲剧诗意。

样板戏与猪舌头

对于近些年时不时地演出和播放革命样板戏，例如“毛泽东热”的时候，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时候，振兴京剧艺术的时候，将“革命样板戏”正名“现代京剧”进行演出和播放，观众意见大相径庭，甚至引起激烈的争论。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李玉和一家三代那么刚强重义气；“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李铁梅那么懂事可爱活脱脱一个刘胡兰再生；“月照征途风送爽”、“打他一个冷不防”，武装斗争最

后解决问题，郭建光好生潇洒利落！“这草包原是一堵挡风的墙”，三个角儿三个行当三个流派三对面“智斗”、“巧周旋”，戏迷们大过其瘾；“朔风吹、林涛吼，气冲霄汉”，“甘洒热血写春秋”，打虎上山何等胆量何等智慧何等威风！没有见过样板戏或者根本没有听说过样板戏的年轻人非常新鲜，非常激动，演出结束后报以热烈的掌声，晚会主办者也因此受到表扬，这很自然，毫不足怪。现代京剧在唱腔革命剧种革命方面功不可殁，现代京剧高水准高艺术，没得说。

但对另一些观众就很难说了，特别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备受暴虐摧残的那些特殊的观众和听众。可以想象，假若在全民学唱样板戏的疯狂中被打断腿的京剧艺术家周信芳还活着；假若在响彻大马路的样板戏重头唱段的高音喇叭声中走向太平湖的人民艺术家老舍死而复生，他们将作何感想？

我不愿意样板戏把周信芳老板和老舍先生带回那个可怕的时期，我们自己也不愿意提起恶魔般的“文革”。我现在收听广播，一当听到那曾经严厉得惊天动地、尖锐到鼓膜欲穿的男高音（哪怕播送一桩一般性的甚至心平气和的事件，也要激烈慷慨拿腔拿势一番，如当年播送两报一刊社论那样的男高音），说句心里话，我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好像天马上就要塌下来。这时候，不管我多忙，不管我正在干一件多么紧要的事情，我都要立刻停下来放下来过去把收音机关掉。收音机里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但我的心里一时半会儿平静不下来。（近一段时间，每天中午都有他激昂的尖声，所以，我只好割爱不听，尽管我常常在午饭时收听这个连续节目。）

干校时期，大家都学样板戏，没有被关牛棚以前就学唱，但是，一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资格唱了。一天黄昏，收工吃饭，饭后在院子里乘凉休息，我拉胡琴，冯牧唱，大伙听，苦中作乐穷开心。因为唱的样板戏

(我和冯牧都是京剧爱好者，我们不唱样板戏唱什么？何况样板戏里一些唱段实在好听)，被人告发，说我们没有资格唱，特别是唱“板儿戏”里的一号人物。第二天队前点名，我俩挨了批。

在揪斗黑帮时或者审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时，革命样板戏是战斗的号角和力量的源泉，革命群众听了长志气，“浑身是胆雄赳赳”，我们反革命听了丧魂落魄、屁滚尿流。

那时在干校，我第二回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成了“五·一六”。揪“五·一六”时，第五连的中国作家协会先后召开过二十多次动员大会，每次开会前，我都要上厕所，赶快上厕所空干膀胱，以免过分紧张而剧烈收缩而遗尿而吓得“屁滚尿流”，所以，会前上厕所就成了我本能的动作。一直到“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只要召开稍稍重要一点的什么会，会前我都要上趟厕所，可怜啊可怜，号角声中的“残酷斗争”留下终生不去的后遗症。

八十年代初，回西安公干，评论家王愚请我吃饭。席间，我和他聊得正起劲的时候，突然，他的脸色变了，非常害怕的样子。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白光一闪，一位表情平常的警察从门外进来，转身，向我们的侧方走去，但是我的朋友惊魂未定。旋即他向我道歉并向我作了解释。

王愚不愚，好思多文，命运多舛，反右扩大化把他划了进去，下过农村，干过杂活，“文革”期间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投入监狱。他说：“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我见了警察就害怕，明明知道现在警察不会抓我，我还是害怕，成了习惯，哎，没有办法！”

我们俩人不约而同地想起狄更斯《双城记》里那位获释的医生曼奈特来，说了许多，一桌酒席竟食不甘味。

女儿要从巴黎把父亲接到英国。父亲——医生曼奈

特行义反被入狱，刑满刚被释放。

破旧阴暗的阁楼。痴呆的“鞋匠”弯着身子忙碌地做鞋。凹陷而瘦削的脸，嵌着两只格外大的眼睛，身子干瘪而瘦弱。长期的迫害使他痴呆失神，害怕光线，只习惯在一线光明甚至是微弱的光下做鞋。也害怕人声，听到有人进门说话，失手将鞋子掉在地上，呆呆看着问话的人，很快又把头埋了下去，长叹一声，拾起鞋子，继续低下头像幽灵似的工作起来。当他知道眼前发生的一切后，以一种习惯性的服从姿势，按照要求吃完食物，穿戴好衣服，顺从地听任女儿挽着手臂走下阁楼。他显然把这里当作曾经长期禁锢他的那个牢房——十八年不见天日的巴士底狱——北塔——三〇五号。

《礼记·乐记》道：“惟乐不可以为伪。”又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样板戏假“治世之音”以“乱世”，“与政通矣”。

艺术的影响因人因时因事而异，不完全是艺术本身的问题，正像文艺界一位前领导（很有名望的作家）那样，口条他是坚决不吃的，连看也不看上一眼，说：“我恨那些拨弄是非的人，巧舌如簧的人！”

一次在全聚德吃烤鸭，先上凉盘，鸭舌可是好东西，他也不吃，十分厌恶、十分鄙夷的。

不过，连他自己也承认，那里的酱口条、这里的鸭掌舌，非常有名。

信不信由你，我可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文化与赚钱

昔有《文学与出汗》，今有《文化与赚钱》，语焉多谐，然不失其真诚。社会越发展，视野越扩大，焦躁的经济越来越向稳固的文化殷勤招手，其中奥妙，怎一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艺术节、文化节了得！

《李嘉诚传》新近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又由作家出版社重版。因为写香港超级富豪李嘉诚的发家史和他的乡土深情，故而颇受好评，在华人世界，大有“天下喁喁，四海注目”之势。